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The Germans **1933-1945**

Milton Mayer

他们以为 他们是 自由的

1933—1945
年间的德国人

[美] 米尔顿·迈耶 著

王崇兴 张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 The Germans **1933-1945**

Milton Mayer

他们以为 他们是 自由的

[美] 米尔顿·迈耶 著

王崇兴 张蓉 译

1933—1945
年间的德国人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1933 ~ 1945 年间的德国人 / (美) 迈耶著; 王崇兴, 张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969-1

I. ①他… II. ①迈… ②王… ③张… III. ①社会调查—德国—1933 ~ 1945 IV. ① D751.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11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1933—1945 年间的德国人

(美) 米尔顿·迈耶 著

王崇兴 张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969-1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定价: 39.00 元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The Germans, 1933-45

by Milton Mayer

Copyright © 1955, 196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十位纳粹朋友：

卡尔 - 海因茨 · 施文克, 裁缝

古斯塔夫 · 施文克, 失业的裁缝学徒

卡尔 · 克林格尔赫弗, 木匠

海因里希 · 达姆, 失业的推销员

霍斯特马尔 · 鲁普雷希特, 高中生

海因里希 · 韦德金德, 面包师

汉斯 · 西蒙, 收账员

约翰 · 凯斯勒, 失业的银行职员

海因里希 · 希尔德布兰特, 教师

维利 · 霍夫梅斯特, 警察

法利赛人站着, 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

1966 年版序言

假定时下的一本小册子在一百年或一千年后再版,那它自始就具有永恒性,对此可能没有任何疑问。但如果它十年后就被再版,而且在作者预先根本没有得到告知且对它没有进行伤筋动骨修改的情况下再版,那么,这位作者是幸运的。十年间,“世事”变迁,但没有如作者曾经预示(或似乎预示过)的那样改变。要是他没有写过第一版中的那些文字,那他现在会呈现给读者多好的东西啊!那就让他做些改动吧,拿出最新稿——出版商对这些琐事非常大度。

我总是极美好地希望,能够做事谨慎。在这一版中,我利用出版商的慷慨,对第一版做了全面修订,我确信这样做是稳妥的。这次修订总共涉及两个词。我在提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时添加了“已故”一词,在抽象地提到现代专政用“斯大林”替换了“马林科夫(Malenkov)”。除此之外,这本书就和第一版没有区别了,如果我必须承认书中尚存错误(以上那两个词除外),那我肯定要承认的。

世事皆变,但有一事例外。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Schoolmen)甚至也承认上帝全能的局限性:上帝不会改变过去。在空闲之时,他会显现过去或者让人们在无意中发现过去,但他不会改变过去。我的10位纳粹朋友在前纳粹时期及纳粹时期的生活——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其他数百万德国人——与十年和二十年前一样,并将始终如此。就我那时对他们进行生活观察和记述的程度而言,这篇报道早就是完整的。过去十年的诸多事件[包括受发生在以色列的艾希曼

(Eichmann)事件的引导而在德国所进行的那些审判]揭示出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10位纳粹朋友所描绘的有关他们自己生活的画面。

本书在初版时,受到一些批评家的关注,但完全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纳粹主义终结于柏林的地堡中,而且在纽伦堡的法庭上签署了它的死亡证明。它已在轰炸声中灰飞烟灭。现在,只剩下了位于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碎片瓦砾。美俄两国全副武装地对峙着,并且,武装到牙齿。没人想要倾听已经完全消逝和被完全遗忘的事物——尤其是不想听到数百万人的鲜血却没能换来任何绝对持久的事物。希特勒攻击了文明世界,而文明世界——最幸运的是还包括了野蛮的俄国人——则消灭了他。够了(*Basta*)。

但是,即便在当时,文明世界已经非常不满于它过去的所作所为,甚至不满意它当时的所作所为,以至于设法停止其在行之事,并对其过去的作为进行长期的思考和审视。纳粹主义是市场上的一剂药物。本书——不止是本书——成为了值得收藏却没有收藏者的藏品。但出版者偶然接到一个人(或一所中学或大学)的询问,后者想拥有它却没能得到。这些询问聚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细流。随着“形势”整体变糟,战后的世界变成了战前的世界,解除武装变成了重新武装。在此情形下,出现了一种没有受到过分限制的情绪:它可能有助于查明使“德国人”的行为如其过去一样邪恶的原因。

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尽管从没有达到如此令人惊骇的程度,却也曾发生过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可怕的事情。但在开明自由的基督教社会中——噢,像我们的社会——以前就没出现过那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至少在基督教社会中不再发生,那么,比起在纽伦堡匆匆挖掘的浅墓而言,略加深入地探究可能是值得

的。在长时间的激情和愤怒减弱之后，墨守德国人天生就是人类敌人这一令人满意的教条和一个（两个或三个）疯子可能会创造或会毁灭世界历史这一更令人满意的教条，同样是困难的。这些就是那些眼睛布满血丝的人们遇到的。人类有许多可取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从争吵中清醒过来。

四个令人惊叹且无可改变的事实促成了上文所述的那种清醒。第一，德国（和波兰，以及其他所有地方）犹太人的死亡，美国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具有人道主义理念的人们一度认为有必要与德国作战来“解救犹太人”。正如最后所证明的那样，那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无论多么令人快意，其行为都可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冲动）。第二，希特勒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对整个国家的摧毁，因为总体上，战场只是军事行动的一个次要领域；被摧毁而又（被刚刚摧毁它的那些人）复兴的那个国家现在已是欧洲工业和军事领域的巨人。第三，德国人现在再次成了文明的基督徒——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还成了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反对无神论者专制的前线守卫者。第四，在耗费了那么多鲜血和财富，并注入了大量的安慰和财富之后，一直存在着有关“德国问题”——无论它是什么——不曾也不会因为反复使用同一种配药而得到解决的疑虑。

随着 20 世纪不断加速地制造超出其所能消费的历史，“德国问题”时而成为关注的对象，时而又淡出视线。朝鲜问题被遗忘了，而匈牙利问题、塞浦路斯（Cyprus）问题和苏伊士运河（Suez）问题则成为了新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匈牙利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和苏伊士运河问题在不知不觉间被迅速遗忘，而我们所有人则在兴奋地期待着中国西藏和刚果（Congo）；在我们有时间从地图上找到它们（或者说找到印有它们的地图）之前，又爆发了古巴问题。古巴问题平息下来，

变成了一种缓慢升级和相互咆哮相结合的事态，越南和罗德西亚（Rhodesia）（或是南罗德西亚？）又支配了我们的情绪。接着是加纳（Ghana）、圭亚那（Guiana）和几内亚（Guinea）。危机成为了我们的日常饮食，并作为外国菜端出来，而且在我们能够吞下（更不用说消化）这些刚刚端到我们面前的东西之前，它们越发呈现出异域风味。美国深深卷入的1958年“黎巴嫩危机”，美国人记住了吗？当然没有。那些岁月，谁会去记呢？谁能记住呢？为什么要去记呢？

“德国问题”则有所不同。它有时离开了舞台中央，但从未完全处于舞台之外。大部分美国人不关注它——他们不可能关注所有事物——除非某种事物一度成了像柏林墙一样的奇观[无论它还意味着什么，柏林墙都是自帕里斯（Paris）夺走海伦（Helen）以来最糟糕的政治过失]。但对欧洲人——包括德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在每个季节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事务。没有忘记1940年夏天的英国人，看到德国新国防军（Wehrmacht）在英国土地上进行演习，会感到惊恐；但他们要是发现有着新领导核心的统一着装的新公民（Bürger），是人们成功构想出来的旨在消除德国征服者不安的一个神话，他们就不会害怕了。

杜默·米歇尔（Dummer Michel）是一位和我的10位纳粹朋友一样的“小人物”，他从未接受上述那个神话。他沉重地迈着正步行走。按照西方世界最低劣的新闻舆论来看，他可能和他以往一样褊狭，一样穿着制服，一样受到庇护。他也许不知道，要求收回奥得河-尼斯河线（Oder-Neisse）以东“失去的土地”的呼声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控制和他一样的人们，而且和要求重新统一的呼声一样，只有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满足上述那种呼声。但他并没有愚蠢透顶。他知道，在他的个人履历中第一次作为工人能够挣到五倍于当兵的收入。

他还知道,美国为了在他的国家中维持自己的军事机构享有的特权,而愿意付好价钱给他——当然也愿意保护他免遭戈培尔(Goebbels)曾预言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的征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年间,废墟上的德国人只想生存下来。现在,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他们就想享乐一番——为什么不呢?只要生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社会主义化的东德人如果能够自上、下或经中间越过柏林墙,他们就可以逃到西柏林(West Berlin)这个繁荣的西方,而后可以到鲁尔(Ruhr)那个更为繁荣的西方;而如果不能越过柏林墙,那他们一有什么,就都会消费掉。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在慕尼黑的勒文布罗伊凯勒(Löwenbräu Keller),富有胆识的西德人一般会用最后一片面包吸干最后一点肉汁酱,把盘子推到一边,喝上一杯啤酒,点上一支雪茄,说道,“当我在这儿享受生活的时候”,他拍着自己的胃,“没人能够把它从我这儿夺走”。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秉持民族统一主义的、愤世嫉俗的西方地图制作者们把这片“失去的土地”称为“中德”),充分就业或更充分的就业仍然是事实。但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总会终结——因为它或迟或早总会如此。西德的通胀惊人,以至于不得不削减预算——取消承诺给予公务员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预算增长,以抵消通胀的损失。杜默·迈克尔的分红制股票没有上涨(或者说实际上是下降了)。他没有任何津贴,因此没有分享到经济奇迹——除非是把他的境况与二十年前那毁灭的状态进行比较。杜默·迈克尔诚实、勤奋、可靠。在道德水平总体下滑的过程中,他已经很少遇到上述那些品性了,街道旁的废弃物已经改变了德国的外观——在希特勒时代之前(和在当时)是极为高效整洁

的。杜默·米歇尔这位传奇的德国工人，他的传奇故事已经抛弃了他（或许这样最好）。

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我在十年前认识了我的10位纳粹朋友，当时，他们从未相信“那种生活”、那个千年帝国会活得比他们长久——正如它确实没有活过他们一样。希特勒将他们推到了疯狂的顶点并把他们固定在那儿，十二年间天天歇斯底里地向他们吼叫。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心怀忧虑。虽然他们相信纳粹主义——因为他们所有人确实相信它的大部分或全部教义——但在时机适宜时他们仍然会尽其所能地摆脱它。他们中没有人会在时机变坏时感到惊骇。

只要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作为卫星国成员的东德人有俄国人的支持；我的东德朋友使我相信，在他们中不到30%的人支持那个政权。作为卫星国成员的西德人，在慷慨的美国人的支持下努力经营着他们的工作和贸易，他们知道自己是美国人雇佣的“盾牌”；我的西德朋友使我相信他们中不少于90%的人将支持而且确实支持这种彻头彻尾地无情和虚假的政策要求。在东欧，我的朋友们使我相信，西德和东德是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所有政策和政治不变的核心。

西德人想在核光辉下——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新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拥有他们的地位，来消除他们最近在理想主义的美国人推行非军事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羞辱。而美国人是那么严肃地宣布了他们的理想，而后又那么严肃地推翻了它自己的理想。俄国人阻止美国人让德国人拥有上述地位。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个轰动的和权威性的头版头条：“六年前，美国已在德国导弹的顶端安装附加物”，其后是美国政府迄今仍惯用的拒绝证实或否

认,随后几天,从华盛顿开始发出一则新闻报告:“国防部发言人昨晚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九国,包括西德的战斗轰炸机已安装了美国的核弹头。”对它们的使用,仍然掌控在美国人手中——只有恶毒的布尔什维克可能会认为不能仰赖德国人——永远不会失控。

本书在十年前初版时,它以如下言语作为结尾:“让人们放任自流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逼迫我的 10 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七千万同胞,重新把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奉为一种民族生活方式。”这一版依然会以这些话语来结束全书。如果说这些文字在十年前具有正当性的话,那么在今天,它们依然具有某种正当性——甚至对我自己的非纳粹国家和非纳粹同胞的未来,也具有某种微弱的相关性。政府已经更为成功地将我的 10 位纳粹朋友和他们的七千万同胞曾经勇敢地经历过,最终在希特勒时代同样勇敢地忍受过的民族生活方式又强加给了他们。他们中的三分之二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另外三分之一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只是一个枝节——虽说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个灾难性的枝节。对德国人,甚而对世界其余地方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又极其糟糕的是德国人暴露在一种如火如荼的狂热中,若是在一个能力较弱的民族中,这种狂热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都不为过。

现在,德国人似乎没有二十年前那么惊恐。如果确是如此,其原因可能是,在当下其他人要比过去更加担惊受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耗资数万亿美元,德国人只花费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他们的民用企业,包括武器制造,都因之繁荣起来)。过去二十年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使得人们不可能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超出了文明人的道德理解力。不久前,《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在西贡(Saigon)报道说:“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出现一个时刻,在

那时,对于人类遭受的苦难甚至是毫无必要的暴行,人们往往会漠然待之。在越南,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时刻。”

德国人仍然是德国人——我们所有人不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的样子吗?或者说至少没有变得更好吧?谁可能在十年前就料到其他可能的情形呢?但有一些人,他们天真地以为,为了世界的利益,也为了德国人,必须要找到新方法。现在,要说德国人的征服者反倒是找到了一种旧方法——教育者接受再教育——这已经被说得太多了。但是,即便新方法能够被用来教育人,要说德国人在今天要比十年前更难找到导师,也不意味着说出了有价值的主张。

十年前,他们要到哪里找导师呢?除了美国还能到哪里呢?但正是在十年和二十年前,美国空军(用美国自己的词汇)在对东京的大规模闪电袭击中,造成的伤亡超出了“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陆军部长亨利·L. 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对美国国内没有公众抗议而感到震惊,他认为,一个没有人质疑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这类行动的国家是有问题的[L. 乔瓦尼蒂和 F. 弗里德:《决定投掷原子弹》,纽约:科沃德·麦卡恩,1965(L. Giovannitti and F. Freed, *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5)]。

尽管如此,我在十年前认为(并写道):臆断德国人仍然指望美国人带来光明,这并不是骄狂。现在,如果我能够,我会变换上述那些言语。但我不能。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并且继续守候着它的希望和人们因拥有它而拥有的各种希望。“我们拥有”——且总是“拥有”——“美国人能够完成一些重要事情这样高远的希望。其他所有人,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或我们自己都不能或不会完成那样的事情。”但现实并非如此。对德国人来说的一些重要事情,即便可

能已经策划过了,也不得不因更重大的迫切需要而放弃。清晰明确的是,现在不是美国人能够完成事情的时机。如果说那个时机曾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错过了。在美国于德国导弹顶端安装附加物之前的一段时间和在 1946 年如下布告被钉在美国位于巴本豪森/达姆施塔特(Babenhausen/Darmstadt)的战俘营大门之后的一段时间,时机已经错过了:

无论是党卫军成员维利·舒尔茨(Willi Schulze)还是下士鲁迪·米勒(Rudi Müller),在你们跨出这道大门之时,你们的步伐会把你们引向自由。遗留在你们身后的是数月和数年的奴隶般的屈从、数年的杀戮和数年间人的个性遭受难以置信的羞辱。那个犯有罪行的政权造成了上述的一切,它的拥护者——如果他们先前还没有自食恶果——都将难逃正当的惩罚。

你们不要自责。你们受到了蒙骗,盲目地追随了错误教义的呼召。自现在开始,你们在家庭圈子中的生活,能够展现出自由的和泰然自若的情态。你们已经摆脱了那应被诅咒的兵役,摆脱了充满罪恶的德国军国主义。在营房院子里,再不会有无节制的命令催促你们或把你们赶进战场。你们军队身份证的灰烬已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和达豪集中营(Dachau)的废墟混合在一起了。

获胜的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经由它们的巨大牺牲——已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永远摆脱了兵役,并承担起了保护你们自由的责任。但作为对这种重大牺牲的交换,你们有义务确保在你们祖国永不再出现对服兵役的渴求,确保德国的年轻人永不再为了普鲁士贵族和他们好战的总参谋部的切望而牺牲他们生命中最美

好的时光,而是从现在开始,他们要把他们的力量和天赋奉献给和平目的。

“美国陆军部”签署了这份布告。

前言

作为一位美国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令我感到厌恶。作为一位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人，我感到羞耻。作为一位犹太人，我感受到了伤害。而作为一名记者，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记者的偏好占了上风——或至少支配我，使我不满意所有对纳粹主义的分析。我想亲眼看一下这类可怕的人：纳粹分子。我想和他交谈并倾听他的话语。我想尝试去理解他。他和我，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的路线前行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

伊拉斯谟(Erasmus)说过，人往往在学校里学到榜样，并将不关心其他任何人。如果我能找到纳粹分子曾经的样子并发现他如何变成那个样子，如果我能和一些同胞面前传播他的典型并使他们注意到它，那么，在这个大众革命专政的时代，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促进他们(和我自己的)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5年，我在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些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那时，我的良师益友威廉·E. 多德(William E. Dodd)是美国驻德国大使，他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但没成功。后来，我在纳粹德国游历并为一份美国杂志供稿。我看到了德国人，看到了那些在我孩提时代游览德国时就已经了解的德国人，我第一次意识到纳粹主义是一次大众运动，而非恶魔似的极少数人对无助的数百万人的专制。于是，我想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究竟是不是我想看到的纳粹分子。到战争结束时，我已经识别出了我想看到的那